

美国大学课堂里的 中国：

旅美学者自述

王斑 钟雪萍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在当今世界大开放的新格局中，“全球化”这个名词不啻是经济、社会范畴内的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发展的需要。表现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领域的“全球化”，则呈现为东西方文化的互渗互动、融会贯通，即以全新的学术视野，“打通”的学术眼光，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渗透、比较研究中抽绎出中西学术的核心价值，并在学术规范、方式方法上衡之一种共通的学术标准，使学术研究不再围囿于“象牙塔”，或是圈子内激赏把玩的“妙品”，而应该使学术研究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普世”的学术价值。

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走在了前列。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了基础的中国文化教育，后又留学欧美，并在欧美著名大学内从事文化教育与研究工作。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他们并没有迷失自我。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吸收西方的文化涵养，一方面他们一样倾情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利用熟谙两种语言的学科背景优势，“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从事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们有时就像一群学术研究的“候鸟”，穿梭往返两大洲之间，利用他们的学术假期和会议时间与国内同行作广泛的学术交流，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创见的学术成果。而这正是我们出版这套“海外华人学者论丛”的缘由。

本论丛收集的大都是这些海外学者近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题材多样，研究形式不拘一格。他们有的文章已在国内外发表出版过，有的则首次在国内出版。我们从审读中觉得，他们的学术视野广阔，学术架构清晰，研究问题敏锐，研究思路富有前瞻性，有些提出了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尤其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术规范的精准操作上，给国内的学术界吹来了一缕清风，我们希望这一缕清风能吹皱起国内学术界的一片涟漪。

学术无国界。在这个存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我们突破这种“霸权”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彰显我们东方的学术价值，以撇清西方大众对我们文化认知与解读上的种种误区。我们需要更多的李约瑟、费正清、杜维明、余英时们，我们需要一批东方学术的“传道者”。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些海外学者们提供一个学术出版的平台，我们乐于充当这样的文化支撑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2日

目 录

序言:王 斑、钟雪萍 / 改写出国留学的“成长小说”	1
陈小眉 / 又是红枫时节 ——写在旅美教学十八年之后	1
李海燕 / 书与剑:课堂中的中国与美国	19
刘剑梅 / 我在美国的教学生涯	29
孟 悦 / “中国结”	39
王 斑 / 全球化、地缘政治与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形象	47
王玲珍 / 剥洋葱:在美国教现代中国性别及女性文学	62
王晴佳 /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 ——美国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缘起和现状探究	72
杨国斌 / 历史对于社会科学的启示: 在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教中国课程	95
叶维丽 / 历史课堂杂记	104
乐 钢 / 哈哈镜中的叠影:我的美国学生	113
钟雪萍 / 一份她者的差事:我在美国教中国	123

改写出国留学的“成长小说”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越来越多人梦想到西欧北美的大学里留学。在人们的想象中,西方高等学府钟楼高耸,庭院深深,草坪碧绿,俨然学术殿堂。教授和学生的举止言谈富有神圣的宗教气息。求学态度严肃,人际交往生动活泼,不乏浪漫情调。西方高等学府被想象成世俗的、人文的、理性的、启蒙的现代宗教圣地。这里的知识是普世的,属于全人类的;立场观点是超越的,全球化的。不管你是什么人种,来自什么国家,身后有什么历史记忆,血管里是什么血缘,到了这学术大雅之堂,就可以将历史包袱弃之门外。你的皮肤也可能变白,英语会染上美国腔或牛津腔。你将通过这个无香无臭、透明的世界语言,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和理性。这是展望未来的个人成长小说的梦境和动因。随着国门打开,改革开放,这篇个人成长小说的情节走向越来越明确。主人公从愚昧封建的人格中脱身,从褊狭落后的黄土地离家出走,奔向蔚蓝,漂洋过海到彼岸留学。进入西域学府,便学会口操“世界语”(其实是英语),与绅士淑女、知书达理的文明人共同交流探讨,对着金樽美酒高谈阔论,共度学术和道德大同的良辰美景。

在出国前,这部文集的作者们多少打过这样天真烂漫的腹稿。到美国留学后,亲身体验此地学术文化,发现这个原来想象中的乐园其实是个海市蜃楼,掩盖的却是与文明学生的愚昧和纷争。他们开始改写、质疑玄想了多遍的、关乎道德文章升华的长大成人小说。作者们大都是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毕业后从事所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早在当学生时期或初到美国之际,作者们就发现,貌似公允、真理的学术中,其实处处绵里藏针、笑里藏刀,学术殿堂可以闻到火药味。世界之大,多元文化平等公理之鼓噪,其实难以容下一张原先想象中那样的宁静书桌。面对学术巨人的雄文巨制,沉浸于丰厚的欧美文化遗产,参与专家聚首的国际研讨会,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却每每觉得像是在继续过去的斗争哲学。在多民族、杂文化的气氛中,压迫、不平、反抗、翻身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留学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不远万里到文明“升平”的西域,原是为追求知识之充实、道德文章之完善,然而却不由自主地

陷入多元文化的剑拔弩张的纠纷中。作学生时,反言表态仍有试探性,任于习进修过程中,可以放过,无需定论,所以并没有太强的纠缠难耐的感觉。等到你当了教授学者,要著书立说,成一家言,引导学生,并陷入学院里的学院政治、学术纠纷时,不想被纠缠也势必要陷入意识形态的争端之中。

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历史,原来以为可以从美国学院的净土,平心远距离观察中国,以期识别庐山真面目。其实不然。世代积存的西方主义的居高临下,永远以道德优越俯察中国的缺陷和丑恶。冷战遗留下的心态,将西方与东方看成水火不容的两个世界。我们光明,他们黑暗;我们民主,他们专制;我们先进,他们落后。全球化的雾障将昔日冷战的敌手幻化为未来的十里洋场:冒险家们在云里雾里瞥见庐山上崛起的经济高楼,期待成为黄金地带的房地产主人。军机财团大员却日益忧患庐山之威胁,但觉那丛林之中、长江之滨,正在聚集一群敌视抗拒现代化、全球化的盲流草寇,正在形成新的革命根据地,抵御现代文明帝国的围剿。冷战心态常常与基督教救世主姿态相结合,每每觉得中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白人救世主来拯救。这些普渡众生的白人都是白马王子,得救者一般不是男生,更多的是受欺凌、让人怜惜的东方佳丽。在课堂或讲座中提及中国人的自主性,自力更生的建国努力,十之八九会遭到这样的质疑:那么那些被压迫的妇女呢?似乎不谈被压迫的妇女,就肯定是在为中国政府抹粉。追求自由,赐予自由,在美国的“中国学”中处处可见,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经常是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代性,总之中国上下古今之不自由,最后的解决只有以自由为武器来攻克庐山,然后把庐山盛景改造成为“帝国的后花园”。所有这些心态都显示出,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没有纯而又纯的空间,没有普世的、公允的审美。我们每天都要和各种成见、歪曲斗,和道德优越感、自卑感斗。

在美国教中国文化,说来也是在从事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大同的盛事美事。文化交流应导致全球之道德完善,促进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和平共存。作者们在改写个人成长小说时,发现理想的叙述中处处有国家民族、东方西方、穷人富人,北方南方之间的权力、路线甚至军事斗争。这种对时势的发现也许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使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理想的纯真和超前,但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没有互相理解,没有世界各国平等大同的诉求,文化永远是政治和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地球无宁日。学院里仍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本文集的成编,来自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国际环境、具体的学术氛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奔向蔚蓝、留学西域的长大成人小说,也许很多人还在继

成长小说的作者们一些改写的机会、质疑的瞬间。文集的编者和作者全都来自中国大陆,作为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的学者在美国生活了十几至二十年不等。对中国和美国社会的观察、认知和了解,可以说是亲历的、实地的,是从战壕里得出的体验。基于这种体验,他们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及其文化逻辑作进一步认识和思考。

作者们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到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教书。由于平时埋头研究和教学,忙于谱写天天向上的学术履历,很少静心反思这一过程中的经历,更少有余裕通过自述的散文文字来传达。所思所想、切肤之感,主要在学术性的文字中得以“理性”的表达。不过,尽管平时并不多考虑自己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什么变化,但有时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在美国似乎身份不清:是“中国人”?“华人”?“一夜美国人”?华侨、旅居海外华人?“美籍华人”?作者们在中国则一般被界定为“旅美(华人)学者”。也许,在上述民族国家、东方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对峙、普世平等的语境内,身份的飘移不定可能是启蒙和发扬理性最为有力的位置。作为在大学教书的学者,我们所拥有的“特产”之一就是多年来这种游移不定的身份。这是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所取得的经验和由此而引起的思考。文集中文章,体现了一种思想和批判的游击战术。作者们在深入讨论教学和研究的方方面面时,不囿于文化上的夷夏之分、中西之间的界限、文化本质论的泾渭。解释和理解文本和社会,放弃阵地战,不搞两军对垒,显示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灵活机动。因此,探讨和发挥这个多重身份,这种思想的游击战术,也许会留洋成长小说的情节枝节横生,让小说里的人物身份、性格变化富于转机。

我们可以稍微看看“旅美”到底有什么机动性、灵活性。“旅美”似乎是个中性稍带褒义的词,一方面包含着对美国的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另一方面意味着接近更为优越高尚的文明,是某种让人羡慕的地位。这里含有当代中国人对美国文化和国威的仰慕,并夹杂着酸葡萄的轻蔑。但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职业习惯和我们的游离身份有利于追究并打破那些僵化的观点、概念和想象。

如果说“旅美”指的是出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年后到美国定居的人的话,那么,我们都属于这一范畴。但这一范畴中各种人群的经历、经验和体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实际上不尽相同。单就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来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旅美”人群来看,大致可根据出国前在中国的背景、出国的途径、出国后的经历和选择看出人群的分流,其中当然还包括各种各样无

非法移民聚集在一些有中国城的街巷里弄，通过非法打工求生存。这些人跟美国国内大量的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移民一样，大都干着美国社会中不能没人干、多数美国人又不愿意干的工作，基本上都处于隐形状态。只有在政客选举的宣传中，或有偶然的意外事故出现的情况下，才会被作为一种负面的存在而被媒体提及。这样的“旅美”人群，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中也基本处于隐形状态而不被提及。

但打工群体的界定，并不意味着在大学里从事高雅的学术就没有打工的嫌疑。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合法”旅美者大多是留学生。其中可根据出国前的经历分为若干代：知青或有“文革”经历的一代，八十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九十年代上大学的一代，独生子女新生代，等等。出国前的经历往往在这些人群身上打上一定的烙印，会在他们旅美的经历中显现出来，尽管并不一定会在出国后个人的生活和职业选择上而分道扬镳。在表面上，大多数人会在经过若干年的求学和求职后，最终在美国社会中找到生存的立足点，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必然会出现融入主流相对于批判主流的两难境况，而一个人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是否主流，也影响了她/他对中国民族国家发展的视角。旅美学人在安家落户后，开始考虑专业之外国计民生、经世治国之大问题。开始被这个社会的各类主要问题和意识形态倾向所吸引，最终形成不同的立场和倾向。从已存的美籍华裔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华人在价值观上，以及在对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理解上的不同。

美国主流媒体的代表者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在内的报纸杂志。主流媒体的代表和他们的虔诚听众，往往以为自己对世界很了解，也总是以为自己对世界的了解是基于最正确的道德立场。如果“旅美”华人的立场被这些媒体所定的话，那么他们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可以说是属于主流精英中的“自由派”。如果不看那些精英主流的报刊，只看电视，那么他们的立场可能不够“自由派”，但仍属大众文化。耐人寻味的是，越是大众文化，往往越是保守，在思想影响的炒作上越是爱炒冷饭。大众和特权经常是同穿一条裤子。另外，也有很多旅美华人根本不关心英文的报纸杂志，信息来源只限于在美国出版的汉语报刊和网络。汉语报刊媒体大都仍然帮闲作美国梦，为主流媒体帮佣打工，比美国的主导阶层更玩命地压抑政治嗅觉和民主批判意识。主流媒体还经常警告美国梦的破产，或指出其漏洞百出，但中文媒体反而不厌其烦地渲染美国梦之完好无损，蒸蒸日上。

明星一定进军好莱坞，中国人的英语一定要字正腔圆，要不就遭孩子的耻笑，云云。简言之，绝大多数旅美华人都是在不同媒体的熏染下形成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这种立场往往会硬化、片面化，形成各类不同的“旅美”华人群体。只注意其中任何一类并且就此认为他们代表全部“旅美”华人，都是不全面的。

华人立场，以至多元文化的参差不齐，并不意味着各种文化族群趋向自由平等，可以互通有无、随意交流。等级和权势的金字塔从来就没有被表面的不同文化杂处震动过。近年来受美国“成功者获取一切”（winner takes all）的文化倾向的影响，国内媒体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身上，有钱有地位就是成功。对“旅美”华人评判成功与否的外加标准还有他们是否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被接受的就等同于成功。从陈香梅到赵小兰到“哈佛女孩”，似乎她们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就一定是中国人的骄傲，完全不清楚中国人进入主流背后的政治背景，及中国人的提升真正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在美国政界的提升，可能会有益于美籍华人，但这不会代表大陆中国人的利益。

本书作者也是旅美华人，但其身份的游移性、游击性，绝不愿作主流媒体——美国和中国的媒体——的应声虫。游击性能产生分析和批判力。这种游击性来自作者跨文化、跨国界的背景，来自对全球地缘政治、全球市场化及历史差异性的思考。比如，对美国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的反思，后面可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的经历和思想背景，可能是五四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可能是八十年代的启蒙和开放。游击性的理性思维，与媒体意象景观中的百花齐放、众说纷纭完全不同。游击学者即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中国的既定文明框架下运作，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心世界上的人们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中可以理喻、可相互通约的相同追求，而在相同的生存斗争中又创造出的不同历史，书写出不同的叙述。因此，在课堂上授业解惑之时，我们可以把文本放在历史的不同脉络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俗称崇拜祖宗、侍奉家庭价值的中国人，在银幕上的形象比天马行空的西方人更追求放荡不羁的个人自由。反之，俗称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反而比任何“东方文化”更加强调中产阶级、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子孙满堂、早出晚归的天伦之乐。教学和研究因时因地，因政治、宗教和思想氛围，因全球和地缘政治大环境，便得出历史性的、因时而异的结论，从而解构了所谓中国、美国文化中的既定方针，挑战所谓亘古不变的先天特征。

在媒体霸权日益加强、日益市场化的今天，随着电子传媒技术飞速发展

个大财团垄断媒体的现代社会,往往缺少应有的历史感和足够清醒的自我意识。对这样的景观社会,应该由启蒙知识分子出面,向迷醉于景观的人群提出批评和警示。在美国社会里,这样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大学的校园里,尤其是在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里。进入美国大学人文和社科的少数“旅美”华人学者,也就有幸成为这类人群的一部分。我们穿越文化壁垒的游击战术,应该比一般美国学者更具历史和分析的深度。

主流媒体为不少旅美华人的个人成长小说提供了潜意识的动因,提供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成功的准则。本文集有意对抗媒体的鼓噪对个人以及民族和群体成长小说的干预和垄断,表达出少数群体中一小部分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多年来身体力行而积累的,基于多学科的信息、概念、观点和立场,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形成自身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尽管每个作者又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观察和思考都是直接源于切身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教学经历中的所见、所思,希望给读者以启示,使得文化交流、中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触目惊心,从而以独立、批判的态度来编写自己的长大成人小说。



陈小届,比较文学博士,教授。1954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1961~1967)、北京帅府园中学(1967~1969)、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1973~1977)、美国杨白翰大学英文系(1981~198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1984~1989)。1969年至1973年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任兵团战士,1970年“上调”到二师十四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报道员,采访、写作五十年代初期“支边北大荒”的“北京庄”、“天津庄”等老知青和新知青的人生路程。曾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1977~1981)、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比较研究系(1989~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园东亚语文系(在职,2003~)。发表戏剧、文学、大众文化、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主要编著有:《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1995, 2002)、《当代中国舞台政治与角色扮演》(Acting the Right Part)、《西方的东方》(East of West, 合编)、《当代中国话剧剧本选介》(Reading the Right Texts)、《当代中国视觉艺术》(Visu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合编)。

又是红枫时节 ——写在旅美教学十八年之后

1981年枫叶红了的时候,我站在美国杨白翰大学的讲台上,第一次面对二十多名高鼻梁、白皮肤的美国学生讲授美国文学和英文写作。这在犹他州一时还成为小小的新闻!就像我的指导老师爱德华(Edward Geary)教授不止一次对他的同事们所说的:不能想象红色中国来的学生能讲这样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修改美国大学生的英文作文,能讲授对美国文学名著《红字》六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和与其相关的文学史。铁幕之内与世隔绝了那么多年,怎么会有人会讲英文,教英文?

其实,这里的苦涩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是自费留学的,不教书,就没有奖学金,就得打铺盖卷儿回家!于是,一个只学过四年英文的工农兵学员,仅有三年教中国学生英文经历的青年助教,不得不硬着头皮从头“恶补”美国文学史,还要研究英文写作的各种文体,以应付每周三天的讲课和改不完的

当时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还不多，周围的美国人都管我叫“红色共产党”(red commie)。开始我还以为他们不过是开玩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他们称谓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仅有的词汇，即便想“尊称”我，他们的语境中也根本没有相应的词汇！我不得不提醒他们：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国家不是红色的，是绿色的，有森林和牧场；是蓝色的，有蓝天和白云。

在冷战后期的美国校园，幽默可能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当然，我更多的是向他们讲起我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他们有的是1949年前后回国的留美留英学生(例如王佐良、许国璋等驰名全国的英语专家教授)，我熟识的邓炎昌教授甚至当过“美国大兵”(他曾是华裔美国公民，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愿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更多的是他们带出来的从未出过国门的一代中年教师。他们辛勤地教书育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文革”中入学的我们当然经历了特殊的英文教育，记得当年背得最熟练的是《北京周报》刊登的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文章的英译文。读书的内容有限，说不上丰富多彩，但是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师们在特殊而又艰苦的条件下全力以赴，认真教学，其敬业精神成为站在美国讲坛上的我终身难忘的榜样。

我还会对美国友人讲起母校的“白求恩”夫妇——伊丽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和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他们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这对夫妇远没有白求恩大夫那样的名气，因为他们走上的不是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而是我的母校的讲台。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培养中国的英语人才工作了四十余年。尤其难忘的是，在“文革”的艰辛岁月中，在所谓“开门办学”、“下厂下乡”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英文教学；当我们因“文革”时期的风风雨雨对中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彷徨无措时，他们仍在讲课讲演时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

以后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我常常感到美国学术界时髦的文化研究有时是隔靴搔痒，自相矛盾。一方面，一些学者常常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最新时髦，大谈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家问题上的西方霸权主义，试图为弱势群体找回他们失去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又轻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具体实践，仍然用二元对立的冷战式思维，用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若他们多少了解一些新中国为根本改变底层民众生存状况所做的种种尝试，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和少数民

也许，他们还会把柯鲁克夫妇尊为一生实践“阶级平等学说”的先驱者——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柯鲁克夫妇就深入中国农村，实地考察土改，写下了学术著作《十里铺》。该书描写的中国穷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土改的空前热情不正和当下西方左派学术界追求的关注弱势群体的思维有着某种契合吗？与众不同，柯鲁克夫妇没有纸上谈兵，空谈理论，而是力图写出农民的经历和声音。这种着眼本土的，对中国民众的关注是至今某些在西方的非西方学者仍没有做到的。

刚刚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告诉我，大卫·柯鲁克于2000年11月1日逝世于北京，他把遗体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捐献遗体的外国人。他的儿子柯马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谦虚地说：“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时，由白求恩的女朋友领着，我的父亲也到过白求恩家里。白求恩牺牲在中国的战场上，我的父亲是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因为行业、时代不同，我认为父亲的贡献不如白求恩。”^①而我却认为，炮火纷飞的战场固然有其悲壮和传奇的色彩，但几十年默默奉献于异国他乡却更需要毅力和宽容。因为没有毛泽东式的中国领袖为其树碑立传，柯鲁克的事迹也许永远不会被多数中国百姓所熟知；但在我心中，却有一座高耸圣洁的纪念碑。柯鲁克二十多岁时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1936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文革”中坐了五年大牢，临终前，他只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认为应有某种标志，我很愿意在北外(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西院居住了四十余年的南楼东北边地势较高的花园内的一棵树上，或一个靠椅的靠背上钉一个小纪念牌”^②。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伊丽莎白那苗条美丽的身影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而过的情景。我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像她一样，讲一口地道的英语，走出中国国门，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结交五大洲的朋友，体验全新的人生经验。

有意思的是，七十年代我“敬而远之”的外籍教师^③，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偶像”。二十多年来“在美国教中国”的经历中，鬼使神差，我竟然真的扮演了与柯鲁克夫妇“在中国教外国”相对应的角色。当然，与柯鲁克夫妇半个世纪前从西方来到穷困的中国不同，作为第一批自费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我是做着“美国梦”和“博士梦”走出贫困的国门，来到富裕的美国的。因此，“对应”不等于“平行”或“平等”。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关注伴随着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四年苦读。其间不乏对中国文化、文学、中西文化差异、不平等地位的苦苦思索。无论是在做博士论文时，还是在教授比较文学课程时，怎样用公正的立场和历史的目光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我关注

“中国问题”。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她的经济实力、政治力量远不如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学生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甚至像我们的前辈、同辈中国学者一样，致力于终身以讲中国故事为职业，是我多年来的诉求。

我对中国话语权和对中国视点的重视，肇始于研究生时期接受的西方文艺理论的训练。1984年开始，我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第一年系里规定了两门必修课：西方文学史和西方文艺理论史。赛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使我眼界大开。^④这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美籍学者从自己本土文化和非西方学者的立场出发，向西方学者阐释东方文化的话语立场及其历史观进行挑战。他认为西方学者在阐释东方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带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西方著作中的“东方”往往是西方景观，而不是东方图像。赛义德的重大贡献在于首次凸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敏锐地提醒人们要警惕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我虽然很欣赏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立场及其丰富的文化、历史、理论的内涵，但他所用的某些话语使我联想起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倡的反霸权思想：“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如果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风行，那么，六十年代毛泽东著名的反帝反霸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比今天时髦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更富有诗意，更具有“中国特色”。

以我所熟悉的戏剧史为例，资深剧作家陈白尘先生1958年创作的独幕讽刺喜剧《哎呀呀，美国小月亮》以文艺界参加全国大跃进的气势，在中国舞台上演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活报剧。剧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主题思想表达了冷战时期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反帝反殖的官方话语。^⑤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方海珍的著名唱段：“定使这上海港，紧连着江南塞北，莽原椰林，支援那国内建设，世界人民”^⑥形象地表达了“文革”期间中国自诩为第三世界领袖的“雄心壮志”。毛泽东的反霸权思想竟和西方后殖民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它却有效地推动了“文革”中的“继续革命”，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和课堂教学中，经常向学生讲述“文革”样板戏的艺术成就以及戏剧舞台和中国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学生们了解到当今西方文

化研究等热门理论及其相关的阶级、性别、种族、国家的论说几十年前早已在中国的舞台上付诸实践。^⑦

从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出发，我在1995年出版的《西方主义》一书中，描述了当代中国的西方主义现象。^⑧我认为不应把反帝反霸权话语“本质化（essentialize）”，认其为一成不变的“救东方出苦海”的仙丹妙药。五四以降，这种反霸权话语曾借助西方民主、科学的想象以完成中国自身的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它也被用来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误导中国民众。从“文革”初期的朦胧诗到现代派戏剧，当代文学中不乏借西方艺术形式及历史叙事来讲“中国故事”的反话语的（counter-discourse）事例。我提醒自己要在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来讲自己关心的“中国故事”，并告诫自己：如果来自中国的学者，为了赶西方理论的时髦，“现身说法”地把中国文学史简单地归结成一部受西方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失语”的历史，那么，这不仅抹杀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西方的对话和反抗的文学史，忘却了中国人自己的批判霸权的实践，而且还戏剧性地重复了毛泽东的反霸权思想，把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民众经过自己的实践摒弃掉了的思潮再次贴上“西方前卫理论”的标签，重新贩卖回中国，使后殖民理论成为具有“新殖民主义”特色的新霸权话语。不幸而言中，今天国内的“后学热”、“后殖民热”，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中国文坛上的重演。

弹指一挥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园已任教十八年。站在美国的讲台上，怎样才能既警惕东方主义的偏见，又防范西方主义的弊端，更要不断防范学术研究中的“二元化”倾向，以凸现跨文化、多边文化研究中多变、复杂、重叠、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不同层面？在我教授的“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小说”、“华裔文学”和“亚裔文学”等课上，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文本。^⑨这里有东方古国发生的妻妾争风、男权至上的情节剧，有满汉风俗的戏剧冲突，有小脚妇人长途跋涉、照料革命子孙的苦情戏，有对革命的想象、参与、迷茫以致失望，有三代女人的儿女情长，悠悠挽歌。“国事，家事，天下事”熔于一炉，写尽了民国史、共和国史、文革史的风风雨雨。这是一个好教、“好卖”的中国故事。一部“女书”提供了一个好读的、好记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大事件年表。但是，它又是一个难教的故事：美国学生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很容易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故事；受尽苦难的中国妇女，只有在移民西方之后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讲不好，它也会成为一个具有“东方主义”意味的故事——即用西方人熟悉的二元化冷战思维方式把它理解为丑化中国的“反共”故事。难怪我的一个学生在课堂讨论时说，读了这本书，我再也不想去这个可怕的中国！可是，同样

是这个学生，几年后却从大陆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她已在中国工作。她在俄大修的这门中国文学课使她从不平、好奇，到最终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她说我在课上讲的自己在中国成长的故事打动了她，使她更热切地要了解来自中国的不同故事，结识背景不同、经历各异的中国朋友。

的确，讲《鸿》这本书的第一步是要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使学生们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然而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启发他们对文本叙事语言的批判立场（critical thinking）。我问学生们为什么《鸿》能在美国畅销，而其他类型的中国书却少有问津？一些好思索的学生有时可以很快地点到问题的关键：“It made us feel good.”（这本书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更有悟性较好的学生甚至提出本书的畅销可以提醒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东方主义思潮仍然垄断着某些西方读书市场。从多元文化的视点出发，我会进一步追问：如果《鸿》能使美国读者感觉良好，那么为什么它的日译本和中文繁体字本在日本、台湾等地也能畅销？有的学生会说，因为不同的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历史的认同会使人们对“他者”的历史文化感到兴趣，以便对自己的文化、社会进行反思。

二

十八年来，无论是教中国文学，或是中西比较文学，我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学生疲倦时，只要我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他们就会精神一振，睁大眼睛，专注地听讲。下课后，有些学生还会和我攀谈几句，感谢我的坦白和诚意（honesty and sincerity）。

我愿意现身说法讲自己的故事，是为了帮助学生尽可能地从中国本土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以提醒他们每个中国人的故事都千差万别，不存在任何普遍性的“中国故事”（universal stories）。他们在读中国故事、看中国电影时，应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个中国故事会“叫座”？它迎合了读者和观众的哪种心理状态？常此下来，每接触到一个新的中国故事，就能使自己的中国知识积累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不是简单地收集有关中国的陈俗陋见（stereotypes）。比如说，观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时，他们应该知道做爱前挂红灯、捏脚不是中国人的婚姻习俗，而是中国导演“东方主义”的包装炒作。

我常常讲到自己的童年。我想告诉美国学生的是：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涂抹上各种色彩的童年。我们不应以某个国家的“幸福”、“自由”为绝对标准。

我的童年就是很幸福的。从出生到上小学，我的童年是在幼儿园的“百草园”。每周虽然只有周末回家，但老师的爱抚，集体的友情，京都金色秋天的郊游，使我拥有一个健康的童年记忆。有的学生会说，这样没有父母呵护的童年怎能幸福，在我们这里，你的父母会被怀疑为忽略儿童罪（child neglect），怪不得人们常讲“共产共妻”呢。于是，我又要费些唇舌“忆苦思甜”，讲述中国妇女曾怎样摆脱旧式家庭的劳累，享受托儿所的社会福利，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以我的妈妈冀淑平的故事为例。1954年，我刚刚出生不久，妈妈为将扮演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叶琳娜而兴奋不已，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有充分的时间做好角色分析的案头工作，妈妈把我送进了全托幼儿园。优越的社会福利使她能够摆脱四个子女的家务重负，像娜拉那样走出家庭，并于1956年在新中国的戏剧史上首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一角儿。而且，事实上她比娜拉更幸运：因为她不必回答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尖锐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经济生活和妇女权益的保障使她无须走出家庭而发现自己。当然，母亲也承认：能享有那样优越的托儿福利的人们是幸运的少数。但对比她1949年以前毫无保障的演艺生活，新中国的确为妇女——至少是部分妇女——提供了一个扮演自己性别角色的舞台。

母亲的舞台生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情趣和爱好，也促使我选择了终生从事中国话剧研究的学术之路。记得几年前应邀到母校印第安纳大学今西性学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 of Sexuality Studies）做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演讲时，听众们对我选放的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妇女识字扫盲、送子女入托的宣传画和幻灯片很感诧异：同时期的美国妇女——甚至是当今的美国社会低层的妇女——也会羡慕这种政府补贴的社会福利（我的女儿日托婴儿班的月费是九百美金，三岁幼儿班的月费是七百多美元。低收入家庭很难承受）！当然，我没有把新中国的妇女生活描绘为天堂。和任何社会一样，中国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也经历了艰难与挫折。我会讲到这一点，但这不是我讲演的重点，因为我的有些听众早已在美国的传媒和畅销书中读到过不少有关“中国苦难妇女”的故事。我在讲台上会把重点放在常被“历史”遮掩的一面。

从小集体生活的经历，使我在十五岁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后，并没有过多留恋家庭和父母。^⑧关于知青的生活，我的学生已在张戎的《鸿》、明安琪的《红杜鹃》以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书中读了不少^⑨，无需我赘述。我并不否定这几部畅销书所揭示的某些历史真实性；但它们也不能代表全部的，甚至是“另类”的有益的知青体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我看到了农村的赤贫，体验到劳作的艰辛，开始要求自己从农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养

一个“常想常新”的视点。

我还对学生们讲：和历史上历次革命一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事件。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它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和债务。^⑩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既有和其他写过“文革”经历的华裔作家相同的“债务”沉淀，也有同样不能忽略的“遗产”继承。我提请他们注意这样一个历史巧合：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六十年代“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影响不无关联。美国反越战、反主流社会的文化精英曾在毛泽东思想中汲取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对美帝霸权主义的思想精华。至今，亚裔文化研究史偶尔也会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六十年代一小批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华人后裔受到黑人人权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意识到受白人中心社会压迫的少数民族应和第三世界被奴役的国家联合起来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国内的种族歧视及其在国际上的霸权政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亚裔少数民族才能真正争取到自身的平等地位。^⑪这一思路成为美国学术界亚裔研究专业起家创业的源头之一。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美国学术界大讲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种族斗争、妇女解放，而不能探讨毛泽东时代类似的遗产及其实践呢？我们是否应该警惕一个新的西方对东方的颠覆，一个新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再现？一个“东方主义”的“幽灵”是否仍在西方“徘徊”？

如此讲述“我的中国故事”之后，有的学生在课堂发言中说，自己从大陆移民来的父母也曾讲过类似的想法，但他们总认为是“说教”而不愿听。而老师在课上讲的中国故事，因为有学术角度和批评视野，使他们第一次珍视起自己父母的故事。我讲的亲身经历和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使她（他）摆脱了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和偏见，并打算尽早去大陆学习，广交朋友，开阔视野。

除了以上谈到的本科生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的十五年间，我有幸开设了不同专题的研究生课程。研究生可以阅读中文文本，我便能更深入地反思毛泽东时代以及我和我的同代人对“毛文体”构成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一次，我复印了1965年6月1日《人民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明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每当我乘着车子经过北海大桥的时候，看到那碧绿的中南海，和那中南海中点点的灯光，虽是一刹那间，却叫我深思许久……

在全国，到处都能够看到灯火，然而最亮的一颗在北京，在首都的中南海。他是世界繁星中最明亮的一颗，是满园鲜花中最美丽的

……
文章结尾写道：

中南海中的明灯啊，你永远是深山中的向导，永远是海洋中的灯塔，永远是滋育万物的太阳，你永远指示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我请学生点评。话音刚落，一位来自大陆的学生愤愤不平地说，这是典型的政治宣传，没有人要听的陈词滥调。但当得知文章的作者是“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陈小眉”，也就是现在站在讲台上的我时，同学们哑然失笑：没有身历其境的后来人也许只能把其中的“毛文体”视为官方宣传机器的运作，而我的童年声音是真挚的，用词是搜肠刮肚、冥思苦想而来。刚刚读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香山红叶》等范文，我真想当作家，随时随地在找作家的感觉，以致在“每日练兵”的日记中记下了放学坐3路无轨电车回家在北海大桥上看到中南海时的瞬间感受。作家不是要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手勤，脚勤，迅速而又准确地记录生活的真实吗？我的同窗好友，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周燕教授当年曾在景山学校的家长会上用她甜美而又真情的声音朗诵《明灯》，作为学生向家长汇报学习成绩的一个项目。现在看来的“陈词滥调”是我们当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童年乐章的一个美好音符。

十一岁的我只有一个“文学梦”。而那时真诚欢歌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学生：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巡回演出的妈妈千里迢迢写信祝贺；在云南地震局“支边”的姐姐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妹妹《明灯》一文的感受；景山学校看门的校工爷爷多次用微笑迎接晨光中走进校门的我，挥着来自祖国各地的信件；素不相识的大、中、小学学生和农村乡镇学校的陌生人真情地谈到他们的“读后感”，要和一个小学生交流写作经验和人生理想。“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斑斓色彩是众人涂抹的。我和我的许多同代人是“毛文体”的共创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是两年后发动的、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和“文革”悲剧的“同谋”和参与者。

从这种个人和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生们比较能够进入到新中国十七年的语境中去，理解那些“为新生活而歌唱”的作家和作品，从而更好地理解五四以降文学史中错综复杂的继承、发展、断裂的现象。近来国内学术界对“红色经典”的关注以及大众文化中“红色旅游”的启动使我感到自己的教学与研

三

以中国的历史为借鉴来审视学生自身的历史经验,既认识到中国历史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共通之处,又认识到个人、家庭、社团、阶级、民族的不同经历对本人身份认同的特殊意义,是我教学中的又一个重点。

在亚裔学生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的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园,我教“华裔文学课”时,沿用毛泽东时代实践过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讲二十世纪历史、美国移民史、华裔作家作品以及跨文化研究理论时,启发学生做家庭调查,了解本家族移民史。每个学生在课堂上作八分钟报告,必须夹叙夹议,有观点,有分析,有事例。经过同学们和老师的反馈后,再写成期末论文,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技巧,集体参与意识和英文写作能力。

2004年秋季的这门课给我印象深刻。三十个学生几乎全部是华裔,只有一个白人,一个越南人,一个菲律宾,一个马来西亚人。这和我以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同类课程时非亚裔为主的学生构成很不相同。有趣的是,不少学生非常喜欢听同学的报告,认为这是难得的互相了解、沟通的机会。一位学生在学期结束后发来的电子信件中说:他以前修课时,总是来去匆匆,很少交到朋友。这次课堂报告使他有和不少同学有了深入的了解,结交了几个也许会保持终生友谊的朋友。我却认为,和以往没有课堂报告的课相比,最成功的是学生们不再把全球史、民族史、华裔文学史当作“别人的故事”,站在远处“评头论足”,而是把家庭史和个人经历带入自己的视野,更自觉地进行批评性思维。

有趣的是,已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并被广泛地选为美国文学经典读本的汤婷婷的《巾帼英雄》和谭恩美的《喜福会》固然使学生们对华裔文学的辉煌成就叹为观止,但是,他们关注更多的却是1945年出版的黄玉雪的《中国五丫头》和1994年出版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Dennis Chong的《姨太太的孩子们》。^⑧也许是因为这两种文本更接近“自传体家史”的缘故,学生们更容易联系自身经历,既探讨故事中的意义与不足,又评判其中涉及到的有关种族、阶级、国家、性别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姨太太的孩子们》似乎颠覆着学生们刚刚在课上读到的美国、加拿大等主流社会歧视、压迫华工的历史;在大萧条时期,北美国白人大大批失业,更无少数族裔的饭碗,许多华工决定回国谋生。而书中主人公Chan Sam却做了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为了保全一个让同乡羡慕的“华侨身份”,他不

国他乡的寂寞之愁。在以后的几十年间,美英在中餐馆赚来的血汗钱被常年失业的Chan Sam寄回国赡养妻子黄婆(译音)及子女。因经济拮据,又不能继承“父业”,后来出生的美英的两个女儿也被送回老家由黄婆抚养。结果一个在抗战中被日本兵强奸后惊吓而死,另一个与黄婆相依为命,渡过了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的艰难岁月。Chan Sam用美英的血汗钱在家乡置办的田产成为黄婆被划为地主的依据,而Chan Sam却在和美英分手多年以后孤独地死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华埠同乡会里,除了殡葬费用外,只为家人留下一张二十加元的支票。这个故事生动地提示我们:海外华工的历史并非完全是种族歧视的历史。中国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为什么滞外不归?为了男人的“外国梦”,女人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华人移民史不应只是男人的历史,或是仅仅发生在彼岸的故事。无名的“黄婆们”的中国故事以及她们欲哭无泪的奉献也应进入华裔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虽然美籍华裔文学通常定义为在美出生的、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后代作家写作的作品,我却希望利用我的中国文学背景,让我的学生更多地了解到英文以外的华人视野。

为了让学生能更好的关注彼岸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我向他们进一步讲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作家用中文书写的海外故事,或曰“离散族裔的故事”(diaspora stories)。在这些故事中,作家们从中国本土立场出发,以跨文化、跨国度的批判视野来描述西方图景,建构所谓“中国身份认同”。中西方文化在这些作家眼中不再是孤立的、二元的,或是“本质化”的现象,而是互补互动的、复杂重叠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对话式的、多元的表述不再是东方对西方殖民主义霸权的消极反应(response),而是积极主动地认识西方,挑战西方,进而建构起(constitute)出自于本人立场的中国身份认同。这种对自身文化的重写,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评判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文人在与西方文化碰撞中发出的一种独到的声音。这也是英语世界很少有人提到的,近乎被淹没的声音。

在阅读了我写的介绍这些故事的英文文章^⑨后(因本科生大多不能读中文),学生们特别喜欢李劫人1923年发表的《同情》和张闻天1924年发表的《旅途》。一反同时期将华人海外经历写为种族歧视的历史,《同情》中的主人公赞赏法国人对他的平等相待;在异国生病住院的六十二天中,他没有因种族身份而受到歧视,也没有因为经济拮据而被拒之门外。随时可能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他,真的成了“病夫”时,反而在“濒死之乡中获得了许多法国贫民的真精神”。^⑩更有意思的是,反倒是这位来自中国的故事叙述者,流露出自己的种族偏见:他惊奇地注意到,“巴黎妇女最喜欢黑人,大约是生理上的关

系”，“虽然旁观者也毫不觉怪，倒只有我们乍从远东来的……反觉得太奇特”。^⑧他甚至认为优生学(淑种学)“完全是自然的”，欣赏法国男子喜欢“充实强壮的”美女，而不是像林姑娘那样的“病态美人”。他希望中国将来的后裔不要“进化到气臭大一点儿便可以吹倒的林姑娘”了。^⑨这种强加在自身的(self-imposed)“西方主义”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向传统中国文化挑战而建构的自身形象和西方想象。同学们在讨论中也提到：所谓的“种族歧视”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可以是西方人歧视中国人，也可以是中国人歧视西方人，或非洲人。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能解释中西文化冲突中重叠复杂的现象。

与《同情》中所表述的种族观念不同，张闻天的《旅途》可以帮助同学们进一步反思跨文化写作中的阶级和性别角色的转换。在中共 1925 年派他赴苏联学习之前，张闻天曾于 1922 年至 1923 年间旅居美国。阅读张闻天赴苏以前的留美故事对于了解二十年代全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十分有益。在某一层次上，张闻天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想象是他建构苏俄革命想象的一个基点。身在异国他乡，他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园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看报，关注苏俄革命，并有感而发，写下了一个鲜为人知，但颇具洞察力的海外故事。

主人公王钧凯在美国当工程师时，不仅受到美国左翼朋友的照料，而且得到两个女友的爱情：金发碧眼的安娜听说钧凯和玛格莱相爱，竟悲痛欲绝，投水自尽。信仰社会主义的玛格莱则在追随钧凯回到“中国去实行革命”的路途上病故于芝加哥。她坚信：“国无论国，人种无论黄白，男女挚爱的深沈与真实与悠久是到处一样的。”她分享钧凯“先把中国革起来，然后革全世界的命”、“俄罗斯既经倡导于先，中国当然应继之于后”的崇高理想。^⑩这个“不分国界，不分种别”的跨洋浪漫故事无疑是中国文学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加爱情”的国际翻版。^⑪而我在解说这部作品的内在含义时，常常将它与美籍华人黄哲伦 1988 年创作的《蝴蝶君》一剧联系起来。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知道，《蝴蝶君》显然是对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反写”；如果说后者描写了一位纯洁、美丽的日本姑娘为负心的美国海军上尉自刎身亡的故事，那么，在黄氏的《蝴蝶君》中，则是一个男扮女装的中国艺人宋丽伶(译音)，诱使一个做着“东方主义女人梦”法国男人坠入爱河，以后他得知真相而绝望自尽。宋丽伶曾这样嘲笑他的法国情人：你们认为蝴蝶夫人式的东方姑娘为西方男人而殉葬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西方“返校节”中的“金发女王(blond home-coming queen)决不会拒绝一个肯尼迪家族的贵族绅士，而去为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男子殉情”。^⑫饶有兴味的是，张闻天的《旅途》可以被想

有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为一个中国男人殉情而死，而且，另一个黑发女郎(brunet)要千里迢迢追随一个中国人到他的祖国去为“被压迫阶级以至于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尽一点力量”，^⑬为“颓丧的，贫困的中国人来抛弃未来无穷的幸福”。^⑭在二十一世纪“普天同庆”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今天，重温八十多年前的一个阶级的梦想，可以帮助我的学生感受到理想主义精神的可贵，以及中国视野与自身经历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我也提醒他们，从性别政治的角度出发，张闻天的“颠覆”是不彻底的：他讲述的仍然是女人为男人殉情的故事。我们解读中文海外故事时也应警惕用男权中心主义抑制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四

上述教学思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启示。在课堂报告中，有的学生能够质疑我们所读过的文本中的词语和概念。一位菲律宾学生在介绍了菲律宾曾先后为西班牙及美国的殖民地历史后，分析了自己赴美后不断变化的五种身份认同。他指出“种族”(race)本身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没有任何人是纯种的某一族；每人的阶级、性别、家庭环境、教育背景都会使他们在生活的不同时刻找到不同的“身份认同”。由于我校没有菲律宾研究专业，他选择了与菲律宾专业最为接近的中国学。目前为止，他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有身份认同。

一位香港学生的经验则不同：她的家庭中没有固定的“国籍”。为了躲避战祸，在二战期间移居香港的姥姥、姥爷持的是香港特区护照，姑姑持新加坡护照，家里另外三口人持英国护照。她只身一人在美国是为了实现父母的“美国高教梦”，为此她每学期要缴付高达八千元美金的学费。她对美国文化和中国身份都没有认同感。读了《姨太太的孩子们》以后，她意识到爷爷、奶奶的故事几乎是 Chan Sam 故事的翻版：爷爷移居香港以后，国内留有一妻五子。妻子辞世后，大姑(爷爷的长女)担负起抚养弟妹的重担——她的经历酷似《姨太太的孩子们》中描写的黄婆。而不甘寂寞的爷爷却和 Chan Sam 一样，在香港另娶了一个姨太太，又生了包括她父亲在内的三子一女。常常失业的爷爷也要指望奶奶的微薄薪水接济国内亲属。两个从未团聚的家庭为了爷爷的发财梦，付出了同样的感情代价。“无国籍”感的她也在这个跨越多重国籍的海外华人谋生史中看到了某种不同而又相同的经历。

班上唯一的一位白人学生的课堂报告别有意味。第一天上课时，一位女生友善地调侃他：“你是班上唯一的白人。”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

同的“白人身份”。读了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他不禁感叹:以前修了那么多美国历史的课,怎么竟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他原来十分崇敬的美国早期总统竟然宣扬美国只能是白种人的家园。调查家族史时,他吃了一惊:独立战争时,他的先祖曾为英国保皇党而战,站在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正义战争的对立面上。南北战争时期,先祖又集结在南方军的旗帜下,为保护非人的奴隶制度而浴血奋战。尽管他的先祖们是欧洲贵族后裔,他却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白人垃圾”(white trash)家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关注更多的是贫富阶级的对立,而不是种族身份的异同。作为摩门教徒,教会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在香港的传教士生活使他有幸结交了许多朋友,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组成了幸福的家庭。他的故事为我们补充了重要的一课:阶级说与种族说同等重要;宗教的影响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视角。

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不能盲目地追随“政治正确”(politically-correct)的立场在美国学堂大讲“种族斗争”等概念,这无意之中使原来并没有种族优越感的学生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差异(differences);单纯回溯历史又容易遮蔽当今美国仍然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课上,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正在进行的美伊战争;许多阵亡士兵大都来自贫困之家,当年义务当兵的主要动机是几年后可以享受免费上大学的福利。向他国输出“民主、自由制度”的对外战争竟是以牺牲美国国内贫困阶级和少数民族利益为前提的。这种联系实际的讨论不常是我有意引导,而是学生们在讨论历史故事中不可避免地发出种种议论。

与这个白人学生的经历不同,班上的华裔学生通常可以在家史和课上所读过的文本之间找到平行故事。和中国息息相关的故事,对我的点评提出了更大挑战。肖兰(代名以保护学生隐私,下同)认为自家的经历比《中国五丫头》中的主人公黄玉雪的经历更为不幸;黄玉雪和其他姊妹出生时,家里静悄悄的。而弟弟出生时,全家大摆酒宴,比过节还热闹。黄氏姊妹无疑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家庭阴影中长大的。然而,肖兰的弟弟却是个“不准出生的人”。^④由于大陆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工厂里做会计的妈妈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躲到农村老家。弟弟生下后,被说成是叔叔的儿子。入小学时,长相酷似爸爸的弟弟不得不在爸爸任教的、全乡唯一的学校里念书;他被爸爸的一位同事认出是爸爸的儿子,爸爸因此被免职。全家只有在移民美国以后,才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面对这个颇受同学们欢迎的课堂报告,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恰当地评说这样一个“中国故事”。我当然可以讲中国人口政策的利弊,讲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若不节制生育将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经济负担。但我自己也不满意这种简单的说法儿。有趣的

是,在期末报告/作文中,肖兰找到了自己的批评视点。采访父亲时,她说她同意父亲的看法,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生儿育女是个人的选择。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男孩儿?如果母亲的头胎是男孩儿,他们是不是就不会再要她这个女儿?难道女儿就不能实现他们的“家族梦”?换言之,父亲的“美国梦”是否同时又是一个“男权中心梦”?读到这篇作文,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学生超过了老师。这门课没白教。当然,我可以再次提醒学生们要重视中国的国情:如果这个家庭来自农村,问题可能不仅是“男权中心梦”。在“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之前,“必须生儿子”是“养儿防老”的传统不变的使然。

林丹的故事则更为复杂。父亲是广州农村中一个贫穷家庭九个子女中的长子。父母终日在田间劳作,他从小就承担着照顾弟妹的重负。高中毕业后,因拒绝参加某项研究工作,被列入“黑七类”,送回乡下劳改;他在那里挑灯夜战,自学成才。几十年来,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实现成为中国第一个宇航员的梦想。后来,父亲遇到了因地主出身而被划为“黑七类”的母亲;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当在海水中失去知觉的母亲苏醒后见到病房里一抹灯光时,她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新生”。父母在香港成婚时,父亲在他的名字中换了两个字,都和“新”字有关。然而,代表着“新生活”的香港生活艰难而孤独,他们又不得不移民美国。而他们的加州亲戚却避而远之,生怕“沾”这对广东老家穷亲戚的“光”。

到此为止,林丹讲了一个关于“逃亡”的、并不新鲜的苦难故事。从七十年代的《巾幗英雄》、八十年代的《生死在上海》到九十年代的《喜福会》,都没有脱出这个路子。^⑤为天灾、人祸、革命、战争而逃离中国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同学们毕竟没有读过“游泳偷渡”的经历,更没有接触过因拒绝参加某项研究而被迫害的近亲。我一时不知该怎样评说:林丹是我们班上“集体意识”中的一个“家庭”成员,评说她的故事与其他华裔文本不同。更棘手的是,我以前讲过警惕东方主义立场的观点也不能奏效:林丹讲的是家史,不是为了出书赚钱,以迎合冷战思潮去“占领”西方读书市场。

面对着刚刚做完报告的林丹的期待的眼光,我不知如何评说,只能诚恳地告诉学生们我思考中的这两个难点,鼓励他们围绕“家庭和个人在重建历史中的作用”等相关题目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我转而“迂回”地评说林丹报告中的第二部分,肯定了她对自己在美国成长经历的分析:生活在加州湾区的华人圈里,爸爸和半个世纪前《中国五丫头》中黄玉雪的父亲相似: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常讲中国的神话英雄故事。但与书本上读到的早期华工遭遇到的种族歧视不同,林丹感受深刻的是阶级偏见。有钱华裔子女笑话她母

亲手缝的衣衫。她也曾羡慕有零花钱买午餐的同学。经济拮据又戏剧性地掺和着另一种“智力偏见”：华裔学生大多是拿全 A 的优等生，但他们性格古怪，有异国族群带来的、类似用狗肉做早餐等所谓的“恶习”。我肯定了林丹没有把种族歧视看成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从阶级说和教育制度运作的角度触及到至今亚裔文化研究中不太关注的“文化歧视”想象。

适可而止，我没能多说出什么。林丹的报告为我出了难题，也为我今后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点……

五

最后，我想讲一个混血女生的故事，为拙文作一个象征性的结尾。

白丽在她的报告中说，与其他同学的家长为了子女的“高教梦”而移民美国的经历不同，她的母亲来自台湾，竟是受“父母之命”以跨国婚姻的方式赴美，开始了几十年单身女人的艰苦生活。仅和母亲见过一面的美国白人父亲，第一次到台湾，就在兴奋之际，匆忙答应了祖父催办的婚约。祖父松了一口气，终于圆满地解决了五个女儿的婚姻大事，圆了一个“美国梦”。三十七岁的父亲也很得意，终于娶了一个美丽、谦和的中国妻子，圆了一个“东方美人梦”。然而，好景不长，有了三个子女的父亲发现自己不适合拖家带口的婚姻生活，毅然离婚，把四口之家从生活优越的加州湾区搬到中部峡谷农业区，安排在一个黑人、墨西哥人和贫困白人占多数的社区。因英文水平低而“无语”的母亲在异地他乡默默地承担着两个“男人梦”破碎后的全部后果，在艰辛中抚养这三个混血儿。作为老大的白丽也经历着与《巾幗英雄》主人公一样的童年：做母亲的英文翻译，以应付各种尴尬的局面。经济拮据的母亲没有选择一栋三室较为宽敞的住宅而坚持住在一个靠近公交车站的窄小公寓，以便让孩子们能到设有“天才儿童专修班”的公共学校就近入学，确保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母亲从未像《喜福会》中描写的那位母亲一样，令人尴尬地在众人面前夸耀白丽的优异成绩，也从未责怪她选择了不易谋生的文学专业。但白丽认为：母亲的悲哀在于用自己的牺牲实践着父辈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想，正是一代代中国人远渡重洋、追求欧美教育的动力之一，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一个侧影。鲜为人知的母亲的故事代表了全球华人——尤其是女人——为此而付出的高昂代价。

拙文杀青时，即将离校的白丽向我告别，约我共进午餐。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英文、中文双学位，成为院长嘉奖的优秀生之一。她打算休息一年后到研究生院主修中国文学或比较文学专业，走艰难的学术之路，终生致力

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她走上讲台，面对肤色各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时，她一定会超越我们今天的思维模式，引导她的学生用全新的视野来回顾人们携手走过的岁月。那时，她一定有属于她自己的“高招儿”。或许，决定从文的白丽最终会写出比《姨太太的孩子们》更胜一筹的自传体小说，继续书写跨洋女性及其后代子孙的风雨路程？

面对美丽、聪颖、坚毅的白丽，我想到自己咿呀学语的女儿：这个中美混血儿也能像白丽那样在这片多元的国土上健康地成长吗？我又想到许多和我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以及他们托付给我们进行高等教育的子女们，再次感到“任重而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只能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用心讲好每一个“中国故事”。

本文原计划总结自己在美国教中国话剧史的体会，没想到用了太多笔墨“铺垫”我的“中国视点”；讲到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华裔文学本来不是我的专业，但海外教学生涯不可避免地促使我去关注这门新兴学科，并与两代亚裔学者合作，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创建了亚裔文化研究课程。这也许也是学院“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打出的一个“擦边球”吧？希望今后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来详谈我怎样在美国教授我最倾心的研究专题：全球语境与中国革命中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

本书出版之际，将又是一个红枫时节！我十分感谢王斑和钟雪萍教授在百忙中主持这本集子的写作。愿她能以丛书的形式一册册地出下去，以记录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美国、在世界各地讲授色彩斑斓的“中国故事”的心路。让我们以自己书写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一部历史档案。

2005年10月金秋

[注释]

① http://www.dayoo.net/content/2000-11/14/content_35484.htm. 原文载《北京晚报》，2000年11月14日。

② 同上。

③ 为了更好地利用为数不多的外籍教师，大卫和伊丽莎白只讲大课，不授小课，我一直没有机会直接与他们交谈。

④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有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评价及其与中国学的关系，请参阅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中国学术》，2000年第2期，第一集。

⑤ 陈虹，《自有岁寒心——陈白尘纪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⑥《海港》,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集体改编。《红旗》,1972年第2期,第34页。

⑦有关中国“文革”时期的艺术实践和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参见 Xiaomei Chen, *Acting the Right Part: Political Theater and Popular Drama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⑧ 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⑨ Jung Chang, *Wild Swans*,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⑩关于我和同辈人在美写作的知青经历,参见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eds., Xueping Zhong, Wang Zhen and Bai Di,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⑪ Anchee Min, *Red Azalea*, New York: Berkley Books, 1995; Sijie Dai, *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1。

⑫戴锦华,《隐形书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⑬ Sau-ling C. Wong, “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 in *American Journal*, 21:1 & 2 (1995): pp. 1~27, p. 3。

⑭ Jade Snow Wong, *Fifth Chinese Daught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Dennis Chong, *Concubine's Children*, Penguin, 1994。

⑮ Chen Xiaomei, “China Writes Back: Reading Stori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Chen, *Occidentalism*, (Second and expanded edi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p. 139~176。

⑯李劫人,《同情》,《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小说卷》,江曾培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556页,第552页。

⑰李劫人,《同情》,第539页。

⑱李劫人,《同情》,第517页。

⑲张闻天,《旅途》,《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小说卷》,江曾培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7~729页,第699页。

⑳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加爱情”主题及风格的英文文献,参阅 Jianmei Liu,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㉑ 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 New York: Penguin, 1986, p. 17。

㉒张闻天,《旅途》,第712页。

㉓张闻天,《旅途》,第682页。

㉔此处借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颇有名气的话剧剧名。《不准出生的人》由西藏话剧团1963年首演。该剧描写农奴的孩子曾被农奴主判为“不可出生的人”,成为新中国话剧舞台上为数不多的、表现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剧目之一。参见王颖,《不准出生的人》,《剧本》(话剧专刊),1964年。

㉕ Maxine Hong Kingston, *Woman Warri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Nien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London: Grafton Books, 1986; and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Ivy Books, 1989。



李海燕,康乃尔大学亚洲研究博士,2003年起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中国文学助理教授。所教的课程有“现代文学通览”、“当代社会与文化”、“妇女史”、“高级汉语阅读”等。研究和论文专题包括文学与文化中的情感观念、性别角色与性史、民族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史、哲学与政治理论以及文化研究。题为《心灵的革命:现代中国的情感历史》的专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与剑:课堂中的中国与美国

刚刚开始接触美国大学生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非亚裔美国学生修中国语言文学课的主要动力是他们对“功夫”的崇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些学生是受了港台通俗文化的误导。作为一个老师,我有责任纠正他们,而不是一味投其所好。我在制定阅读计划时就比较偏重精英文化、经典作品和“正史”类的材料,而不喜欢采用武侠小说或功夫片。美国的汉学界似乎也在很长时间里持同样的清高态度,所以近到两三年前居然没有一本像样的武侠小说的英文译本。我也就拿这个借口来堵那些不会读中文的本科生的嘴。

近两年来,长期的后现代思潮的熏陶和文化研究的实践已驱散了这些成见以及传授“真实中国”的唐·吉诃德似的使命感。我本人不仅对通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发现与美国人讨论他们心目中由通俗文化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别有一番意义和收获。我不再愿意轻易地给别人扣东方主义的帽子,或对别人留恋“古老中国”的神话而不屑一顾。相反,我往往借用学生酷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来引发他们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反思,对以性别、民族和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评,也对“中国”、“美国”等作为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跨民族/跨国界的建构达到一定的共识。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几年前横扫北美影院的电影《卧虎藏龙》。众所周知,这部片子的主要艺术源泉是台湾出生的导演李安在青少年时代所饱览的港台武侠小说和电影。他理想的观众想必也是遍布欧亚和北美的武侠迷。使他欣慰的是,许多以前不大欣赏功夫片的观众也被他独特的电影艺术所打动,而成为这一国际现象的最新追随者。大学生尤对该片乐此不疲,我的学

- 《海港》,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集体改编。《红旗》,1972年第2期,第34页。
- ①有关中国“文革”时期的艺术实践和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参见 Xiaomei Chen, *Acting Right Part: Political Theater and Popular Drama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② 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③ Jung Chang, *Wild Swans*.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 ④关于我和同辈人在美写作的知青经历,参见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Mao Era*, eds., Xueping Zhong, Wang Zhen and Bai Di.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⑤ Anchee Min, *Red Azalea*. New York: Berkley Books, 1995; Sijie Dai, *Balzac and the Chinese Seamstr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1.
- ⑥戴锦华,《隐形书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⑦ Sau-ling C. Wong, “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que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 in *American Journal*, 21:1 & 2 (1995): pp. 1~27, p. 3.
- ⑧ Jade Snow Wong, *Fifth Chinese Daught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ennis Chong, *Concubine's Children*. Penguin, 1994.
- ⑨ Chen Xiaomei, “China Writes Back: Reading Stori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Occidentalism*, (Second and expanded edi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p. 139~176.
- ⑩李劫人,《同情》,《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小说卷》,江曾培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556页,第552页。
- ⑪李劫人,《同情》,第539页。
- ⑫李劫人,《同情》,第517页。
- ⑬张闻天,《旅途》,《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小说卷》,江曾培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7~729页,第699页。
- 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加爱情”主题及风格的英文文献,参阅 Jianmei Liu,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cep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⑮ 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 New York: Penguin, 1986, p. 17.
- ⑯张闻天,《旅途》,第712页。
- ⑰张闻天,《旅途》,第682页。
- ⑱此处借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颇有名气的话剧剧名。《不准出生的人》由西藏话剧团13年首演。该剧描写农奴的孩子曾被农奴主判为“不可出生的人”,成为新中国话剧舞台上为数不多的、表现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剧目之一。参见王颖,《不准出生的人》,《剧本》(专刊),1964年。
- ⑲ Maxine Hong Kingston, *Woman Warri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Nien Tsui-tsz,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London: Grafton Books, 1986; and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Ivy Books, 1989.



李海燕,康乃尔大学亚洲研究博士,2003年起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中国文学助理教授。所教的课程有“现代文学通览”、“当代社会与文化”、“妇女史”、“高级汉语阅读”等。研究和论文专题包括文学与文化中的情感观念、性别角色与性史、民族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史、哲学与政治理论以及文化研究。题为《心灵的革命:现代中国的情感历史》的专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与剑:课堂中的中国与美国

刚刚开始接触美国大学生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非亚裔美国学生修中国语言文学课的主要动力是他们对“功夫”的崇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些学生是受了港台通俗文化的误导。作为一个老师,我有责任纠正他们,而不是一味投其所好。我在制定阅读计划时就比较偏重精英文化、经典作品和“正史”类的材料,而不喜欢采用武侠小说或功夫片。美国的汉学界似乎也在很长时间里持同样的清高态度,所以近到两三年前居然没有一本像样的武侠小说的英文译本。我也就拿这个借口来堵那些不会读中文的本科生的嘴。

近两年来,长期的后现代思潮的熏陶和文化研究的实践已驱散了这些成见以及传授“真实中国”的唐·吉诃德似的使命感。我本人不仅对通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发现与美国人讨论他们心目中由通俗文化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别有一番意义和收获。我不再愿意轻易地给别人扣东方主义的帽子,或对别人留恋“古老中国”的神话而不屑一顾。相反,我往往借用学生酷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来引发他们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反思,对以性别、民族和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评,也对“中国”、“美国”等作为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跨民族/跨国界的建构达到一定的共识。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几年前横扫北美影院的电影《卧虎藏龙》。众所周知,这部片子的主要艺术源泉是台湾出生的导演李安在青少年时代所饱览的港台武侠小说和电影。他理想的观众想必也是遍布欧亚和北美的武侠迷。使他欣慰的是,许多以前不大欣赏功夫片的观众也被他独特的电影艺术所打动,而成为这一国际现象的最新追随者。大学生尤对该片乐此不疲,我的学